

## 美国双重围堵，中国如何破局

乔 良

### 一、美国“重返亚洲”，中国面临“严冬”

美国正在高调“重返亚洲”。其实，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亚洲。所谓重返，无非是发出一个强烈信号：这一回，美国要真正开始重视亚洲了。此前，从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通过广场协议，成功地扼杀了日本崛起的势头后，亚洲的新兴国家在美国人眼里，都不过是它予取予夺的提款机而已，不再有谁是它的挑战对手。

但是，过去20年，风流水转，中国起来了，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欧元启动，恐怖主义兴起，中国复兴，这三大因素开始有可能危及美国人的世纪梦想：持续了200年的“美国世纪梦”。

为此，美国人穷10年之力，击毙了本·拉登，象征性地结束了反恐战争；又通过欧债危机，使欧元陷入一时难以自拔的困境。接下来，还剩下一个麻烦，那就是中国。

当美国经济遭遇金融危机重创，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将其经济拉出泥潭时，美国人别无选择，不得不拿出自己曾经屡试不爽的老招数：我的日子不好过，那我就折腾别人，让别人的日子比我更难过。最后，水落石出，相比之下，还是我的日子更好过。

于是，奥巴马和他的团队频出阴招，在西太平洋上空演出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杂技。先是通过“天安号事件——延坪岛事件——黄海军演”，把本已有离心倾向的韩日两国一边倒地拉向美国，在稳住东北亚的阵脚后，又掉头南下，挑唆和鼓动越南、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反复滋事；恢复对台湾出售武器；向缅甸政府释放“善意”，在原本关系不错的中缅之间打进楔子；跟新加坡谈判部署沿海快速舰基地问题；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个驻扎25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军事基地；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在打完这一系列地缘战略的组合拳之后，真正富有深意的战略动作也跟着出台，那就是主导甚至主宰亚太经济。因为在美国人看来，一切战略利益最终都要表达为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的获得只能通过财富的转移来实现。环视全球，受美国经济影响和欧债危机拖累，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表现低迷。只有亚太地区，由于有渐成地区经济火车头的中国牵引，尚有活力。对美国来说，无论是让自己的经济脱困，还是要把亚洲的财富最后变成美国的财富，都必须刻不容缓地向亚太开刀。因为如果现在不动手，在等到亚洲国家围绕中国重新排列起新的雁阵时，美国想做什么，恐怕都为时晚矣。

一不做，二不休。奥巴马和希拉里轮番

出击。极力架空甚至废弃已存在了近20年的“APEC”机制，然后，借壳上市，把原本默默无闻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变成美国主导乃至主宰亚太经济的新平台，为亚太经济重新定则立规，用其将亚太国家一网打尽，独独把中国排除在外。

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为什么要力推 TPP？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明确表示，把推动 TPP 作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重点。美国试图以 TPP 为突破口，建立以其为主导的横跨太平洋的亚太经济合作体系，并由此建立美国主导的‘亚太自贸区’，进而赢得全球的战略优势。TPP 谈判出现的背景是，亚太特别是亚洲区域经贸合作进展迅速。美国一方面不愿错过亚太经济发展良机，同时也希望通过设置一定规范继续主导这一地区未来政治、经济等格局的变化。”

所有这一切，只有一个目标，剑指中国。对满怀热情拥抱全球化，以为可以通过市场经济话语与美国和西方这些意识形态语境不同的国家找到共同话题的中国来说，这无异于兜头一盆凉水。

当切分财富蛋糕的游戏变成一场零和游戏，你的获得就是他的失去时，共同的语境就只能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的残酷对话。

依据美国在过去两年间对中国所做的全部动作来判断，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环绕中国的地缘战略和经济战略的双重严冬正在来临。中国，必须做好过冬的准备了。

## 二、美国为什么要对中国出黑拳、下狠手？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并没有过去。美国经济今天远不是尚未复苏的问题，美国次贷的第二个债务违约期已经开始，而2007—2008年次贷危机中被掩盖的美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也陆续开始释放。这对美国经济复苏是一个严重的牵制和打击（中国亦不能幸免。因为这一轮危机会导致美国经济

进一步衰退，再通过贸易联系传导机制，使世界贸易整体衰退，从而导致中国的外需萎缩，压抑中国经济增长），也是美国政府极力在欧债问题和南海问题上做文章的重要原因。因为美国政府不希望全球视线过分聚焦在这一点上，从而动摇对美元和美国的信心。

美国债务上限问题的艰难解决，虽然让美国也让全世界的债主们松了口气，但谁都知道，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解决不了美国仍须靠借债度日的本质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指出：美国国债已占其 GDP 的 99%，预计 2012 年将达到 103%。美国财长盖特纳承认，美国政府每花 1 美元，其中就有 40 美分是借的。包括国债在内，美国公私债务总额已高达 55 万亿美元，人均负债 17.6 万美元，家庭平均负债 67 万美元。而美国年度税收仅约 3 万亿美元，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约 5 万美元，这说明美国已深陷入不敷出的债务困境。）因为这一问题是与美国靠向全球输出美元这一方式生存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特里芬难题”是美国经济愈来愈解不开的死结。

造成美国经济今天这一局面的原因，是美国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解体后这大半个世纪里，由于掌握了国际流通货币的金融高端优势，而逐渐放弃了对那些处于低端的实体经济的眷顾。美国之所以过去 40 年里把大部分中低端制造业当作“垃圾产业”转移出去（只把高端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保留下来），是确信可以通过全球信任的美元体系，使新兴国家成为其廉价提供中低端产品的加工厂，说白了也就是为挣美元给美国打工。而当美国为脱困不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滥发美元，使美元越来越弱势，美元的信用也日益受到普遍质疑时，美国即使没有“实体经济”，单靠“虚拟经济”就能过好日子的局面也就难以为继了。

现在，金融危机的引爆和发酵，使美国靠输出美元输入全球财富的模式已不可持

续，这意味着“华盛顿共识”的不可持续。眼下，看不出美国能够拿出新的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的新模式。美国今天所做的一切，都还是在拼命维护和挽救这一模式，但对其前景的预期是悲观的。

在这一本质性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之前，奥巴马所许诺的“再工业化”和“五年内出口翻一番”的目标，都将是画饼充饥。

这首先是因为美国劳动力成本过高，而各类工会为了自身利益，又都不肯降低从业员工薪（这次 NBA 劳资双方工薪大战就是最新例证）。如果美国的“产业空心化”这一致命现实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美国的衰落就几乎不可避免。这不是通过玩弄“压人民币升值”这种伪命题就能解决的。因为美元要获得“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这一地位（只有获得这一地位才能带来美元霸权），美国只能通过贸易方式向全球输出美元，这也就必然造成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一“特里芬难题”既是美元的天然优势，也是其天然缺陷。其优势是美国可以通过输出“绿纸”而廉价获得全球的产品和资源。其缺陷是如此一来，美国只能使自己长期处在贸易逆差状态。这意味着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获得产品（也就不存在美中贸易逆差，当然也就谈不上操纵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必须从其他国家获得替代产品，仍然解决不了其逆差国地位的问题，当然也就无从解决其国内民众的就业问题（因为其民众不可能都就业于高端产业，而一度达到的 70% 就业人口从事金融和金融服务业的“盛况”，也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业的萧条而不可能重现）。这种自己脸丑怪镜子的做法，对解决“美国病”于事无补。就此意义来说，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美国病”是本体性的，起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一般的决策失误或监管不力造成的。这一根本性的缺陷恐怕只有美国放弃美元霸权，放弃美元一仆二主的矛盾地位，让位于“世界元”，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就意味着压人民币升

值真正的目的是，美国宁可转向其他国家寻求替代产品，也要给中国的出口依赖型经济以打击，因为那些可以为美国提供替代产品的国家，无一能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而中国对美有可能挑战正是美国上层最担心的事情。所以，打击中国是目的，解决其国内就业只是幌子。因为两个目的只能实现其一，那就是打击中国，就业问题是根本解决不了的。美国国会的议员们肯定明白这一点，只是拿中国产品抢了美国人的饭碗说事罢了。既然如此，中国应明白美国的用心，做好彻底“下车”的准备，不必再与美国打口水仗。因为中国必须认清，美国的那些国会议员极力推进这一议案是铁了心的，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阻止中国经济增长（带动中国国力、军力的增长）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最终的威胁。明白了这一点，中国就应该丢掉一切幻想，只能与美国进行冷静的合作和清醒的博弈。

### 三、如何脱困，美国还需要一场战争

无论我们现在如何不看好美国的未来，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即使在美国金融危机如此严重、美元霸权可能崩溃的情况下，眼下仍无一种货币可以替代美元的地位。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和一般贸易，仍摆脱不了美元结算的惯性力。（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天发生的国际贸易中有 86% 涉及美元结算。）美国也充分了解这一点。因此，为摆脱这种困境，继续延长自己的霸主地位，给自己赢得“舔伤”的时间和空间，美国当然要想办法拉其他国家为其分担风险，同时给一些国家制造麻烦和难题，让所有这些国家顾不上指责美国、怀疑美国、甚至对付美国。这是美国的一大策略。欧债危机、南海问题、北非中东变局，都是美国在下先手棋，四处布子，给不同的对手制造不同的麻烦。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一直在努力克

服危机对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带来的沉重打击，尤其是努力摆脱全世界对美元信心下降的不利局面。美国需要大量的美元回流支撑其国内经济的流动性。吸引美元回流美国的办法，一是靠美国高科技支撑的高回报率的投资环境（这一点现在已没了指望），另一点就靠发行美国国债（美国国债利率虽低，但相对安全，且几乎没有上限，想买多少买多少，但债务上限的风波也让世人对其偿还的前景产生越来越多的疑虑）。对美国人而言，自从踏上美元霸权道路之后，其经济就已成为一种信心经济，只有世人对美元信心充足，相信美国的国家信用，才会让更多美元回流美国，给美国经济赖以生存的信贷模式引入活水。尽管美国的两任财长以及贸易代表、联储主席都跳出来发出利好信号，但是美国实体经济振兴道路艰难，金融改革进展缓慢，就业、市场的实际情况都不尽如人意，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使用后经济仍未见起色，且反而让世人对美元“兑水”大为不满，更加担心。美国巨额国债又牵动着国际关注，国家信用面临质疑，这些问题都无法令人看好美国经济的复苏前景。无法提振世界对美国的信心，无法恢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这让美国非常难堪。

在这种情势下，美国将会做什么？美国还能做什么？也就是说，美国最有可能通过什么办法让自己脱困？我认为不外乎三种方式。

其一，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是“技术脱困”，就像当年美国人用IT业引领全球经济，让自己赚的盆满钵满一样。但眼下，这种前景似乎很渺茫。除非美国能在能源技术上获得突破，则可能一举解决许多麻烦，美国将重新凤凰涅槃，所以，我们对美国在能源技术上的任何进展都应保持关注和警惕。因为在能源日渐紧张的情况下，谁能掌握新的能源技术，谁就可能控制世界的未来。如果美国掌握了这种技术，就可能使全球经济重新翻盘，确保美元地位不可撼动。

其二，是“赖账脱困”。对这一点，我们要特别警惕和提防，美国继续在美元上做文章。不能排除美国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超发美元，让美元的信用烂到极点，再借助其世界第一的黄金储备，突然宣布部分恢复金本位制，让美元重新与黄金挂钩，从而重新为美元定值，借以达到与旧美元脱钩、金蝉脱壳、实现其赤裸裸地赖账的目的。但这一步棋是双刃剑，伤害别人，也伤害美国自己，不到万不得已、无路可走时，美国应不会出此下策。

其三，就是“战争脱困”了。通过战争既能拉动美国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摆脱国内压力，又能在国际上重新为美元树威。用战争对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能源价格产生决定性影响，就能对国际投资环境及经济重新洗牌，改变国际资本的投向，使美国最终成为受益方。眼下看，美国人的下一个最接近水到渠成的打击目标是叙利亚，最有可能打击的目标是伊朗，最出人意料的目标是委内瑞拉。

#### 四、内在的稳固和强大是应对美国挑战的最有力武器

欧债危机动摇了人们对欧元区经济的信心，也给欧盟的发展前景带来了不确定因素，作为单一货币的欧元对美元储备货币、基准货币的挑战也就大大减弱。因此，当我们看清美国的这种大战略后，就必须尽早研究和部署真正管用的对等战略，见招拆招地应对之。

首先，作为一个大国，外交、军事这两只轮子必须相互配合，要善于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不能在国际舞台上只有一个表情。最近几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这种论调的提出者自有其意图，但客观说来，“中国威胁论”也并非完全抹黑中国。因为近年来中国的体量上升、体能提高，别人自然会有压力，这几乎是每一个大国崛起

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情况。面对“中国威胁论”，我们以往采取的方式是不断做解释：我们不威胁他人，我们是和平崛起。但这种宣示收效甚微，想用宣传去消除他们的这种看法和偏见是很困难的。既然如此，索性就少在这方面下功夫，不妨该强硬的时候强硬一些，让那些持“中国威胁论”、想给中国制造麻烦的人习惯中国“威胁”的存在。

就此意义来说，我国首艘航母的出现，肯定会在那些“中国威胁论”的想法上加上一个极有分量的砝码。因为中国的安全不能依靠驱逐舰来维系，我们还需要“大家伙”和“硬家伙”。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参与度提高，中国有大量的海外利益需要国家力量的保护，中国又是资源进口大国和能源消耗大国，国际通道的畅通和安全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意义非比寻常，需要有更多的利器保护我们的商船和海上生命线，同时也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就这一点而言，中国拥有航母会是治疗“中国威胁论”患者，让他们脱敏，也给他们带来相应利益的好药方。

其二，对于那些一心想给中国制造麻烦的人，中国不妨像美国那样，也下先手棋，给麻烦制造者制造麻烦。我们这些年一直强调国内稳定“不折腾”，这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际上你也完全“不折腾”。比如在东海或南海问题上，在外交和动武之间，有巨大的灰色地带可以有所作为。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在如何“作为”上，要动脑子，讲智慧，而不是蛮干。美国这些年对中国布局下棋，打擦边球，这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和效仿。

其三，中国需要用好手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可以多投否决票和赞同票，少投弃权票，要把否决票和赞同票作为组合拳来打。从联合国决策机制来看，否决票或赞同票都体现为加一票或减一票的力量，而弃权票则无法显示这一票的立场和力量。中国要尽量减少投弃权票，从而避免在别人眼里

你就是个零的看法。你可以在一些问题上先投否决票，然后与别人讨价还价，在别人接受你的条件后，再投赞同票，通过这一过程让别人明白，中国是它绕不过去的力量，使他们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不能不考虑中国的看法。

其四，中国要用好手中巨额的美、欧、日国债，把巨量外储和美债、欧债作为战略武器来使用，而不是只考虑它的安全性或投资回报率。乍一看，中国买美国国债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被美国所绑架，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巨额美元国债实际上令中美两国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互相绑架”的状态。对中国而言，买美国国债易，投资美国难，持有美国国债确实是不得已的选择；但对美国而言，巨额债务降低了美元的信用，美元信用是美国经济的生存支柱，美元信用下降，最终会损伤美国经济本身。如果美国真的违约，中国拥有的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约有1万亿是美国国债，确实存在损失风险，但这种损失风险是可以估量的，或者说是可控的；美国则不然，违约就意味着美元信用濒临崩溃，其基准货币、储备货币的地位会大幅下降，进而与大宗商品定价、国际贸易结算脱钩，这显然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这绝对不是华尔街乃至华盛顿愿意看到并接受的。中国的损失在当下，美国的损失则在未来，孰轻孰重？美国掂量得很清楚。这种“互相绑架”使我们拥有了金融战略武器操作的空间。

其五，中国要敢于“做负责任的大国”，但我们履行这些国际责任和义务决不是依照西方的指令。首先我们要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安全，并自愿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如中国舰队在索马里护航，应优先考虑确保本国商船、油轮的安全，并向提出要求的他国船只提供护航服务；更重要的是，中国要在关键时刻为兄弟国家和准盟国有所担当。从既往经验来看，对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友好国家，各个层面的合作意愿需要加以保护和

维持，一些问题上要互通声气、彼此支持，这对于我们打击分裂势力、恐怖主义活动会有很大帮助。在今天的国际社会，只有支持了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支持，从而避免孤立，获得别人的支持没有免费的通道。

其六，加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减少出口依赖，特别是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使中国经济面向世界有更强的适应性。在完善金融体制，增强金融体制的防冲击、抗打击能力的前提下，逐步完成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贸易对手更多地进行货币互换和人民币结算，是不错的方法。中国已处于资本扩张期，但资本的输出生不是人民币而主要是虽然巨量但毕竟有限的外汇储备，对这一点，要有清醒的认识。非本币扩张是不可持续的，而且风险很大。

其七，必须加大整军备战的力度。中国周边群狼环伺，连狼崽子也敢从“龙口夺食”。而更重要的是做好比对台军事斗争更大的军事斗争准备。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不等于小战、中战打不起来。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战争危险不是在减小，而是在增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重建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是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出路。必须懂得这一点如解决不好，就有可能危及党和国家的生存。任何时候，内部的稳固都是外部强大的根本和基石。中国这样的国家，你自己不垮，没有任何力量能搞垮你。■

[乔良：空军指挥学院教授，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 顾海燕)